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张帆 刘小新 主编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张帆 刘小新 主编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 张帆, 刘小新主编.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81130-348-3

I. ①文…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②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0-52②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998 号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Wenxue Lilun yu Wenhua Yanjiu

主 编/张 帆 刘小新
责任编辑/芮月英 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4. 75
字 数/507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348-3
定 价/56.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第一辑 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试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论述	南 帆	3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建立	王 伟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 90 年来党的文艺思想	陈舒劼	13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述评	南 帆 刘小新 王 伟	21
普及与提高	南 帆	29

第二辑 底层话语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	南 帆 郑国庆 等	37
曲折的突围	南 帆	52
——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		
“底层经验”的表述与被表述：论争背后的话语策略分析	滕翠钦	65
底层与大众文化	南 帆	73
解码“底层”：想象、象征与实在界	蔡志诚	77
“现实主义”和文学批判	滕翠钦 陈舒劼	85
——兼论中国当下语境中“底层文学”的美学风格		

第三辑 关系主义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南 帆	101
多维的关系	南 帆 练暑生 王 伟	113
关系主义，或一种历时的总体性	蔡福军	125
关系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滕翠钦	129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廖述务	136
关系主义文学史观与当代文学、文化图景的重构	郑润良	142
“关系主义”与“相对主义”	王 伟	147
理论自反与体系重构	廖述务	153
——评南帆、刘小新、练暑生合著《文学理论》		
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文学理论教学范式转移	陈长利	165

第四辑 意识形态与形式

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南 帆	173
反“目的论”	卞友江	191
——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再认识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视域内的“形式”概念	郑海婷	200
体裁诗学：历时之轴与共时之轴的交汇	颜桂堤	210
形式与内容的适合	王 伟	216
——詹姆逊辩证批评标准的乌托邦		
形式、历史和话语中想象	练暑生	227
威廉斯论述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韩瑞峰	231
卢卡奇与文学总体性	蔡福军	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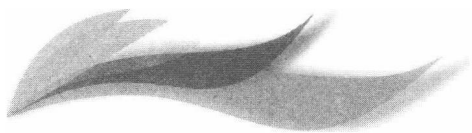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开启新的视域	南 帆	251
文学、文化研究和关系主义	滕翠钦	256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王 伟	267
——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		
不竭的挑战	南 帆	273
挑战与对话：文学、文化研究和权力	颜桂堤	287
文化理论的限度与“理论之后”的超克	李长生	301
文学研究、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	周红兵	313
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	朱立立	322
——评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		
2011 年台湾地区文化研究述略	刘小新	333

第六辑 文化建设

对话：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南 帆 刘小新 林秀琴	347
文艺与文化生态环境	南 帆	357
关于提高福建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研究		
	曲鸿亮 周道华 陈 蕾	361
网络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认同路径	陈舒劼	376
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魏 然 刘小新	381



第一辑

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试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论述

南 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代表性文献,《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引言”部分阐明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研究如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随后,“引言”简要地提出了文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结论”部分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个论断的基础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关系,并且涉及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核心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文艺批评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环节。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讲话》始终作为文艺工作的指导纲领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毛泽东的领袖威望日益提高,这份文献之中的一系列观点成了不容置疑的经典言论。如今看来,《讲话》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出现的;在数十年的文艺发展之中,这份文献的历史作用相当复杂,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论述派生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

20世纪之初,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以激烈姿态与传统文化决裂。他们倡导的“文学革命”公开地亮出了这样的意图:废弃深奥晦涩的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启蒙大众的工具。无论是胡适的“八项主张”还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以文学为根据地推广一种妇孺皆知的白话文。这是教育大众、开启民智的基本保证。这个意义上,文学革命的成功表明了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领袖地位;大众只有在知识分子的开导之下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白话文承担了非凡的历史意义。这场新文化运动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但是,民间的“引车卖浆之徒”业已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这场运动框架的一个部分。这里,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已经有启

蒙的主题设定: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对象。启蒙与被启蒙是二者关系的第一种模式。

在“左翼”理论的声援之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众文艺”的论争。参与论争的“左翼”理论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产生分歧:文艺必须深入大众,拥有大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这是启蒙主题的延续,也是革命任务的迫切渴求。许多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方言、民谣、短剧、绘图本小说、漫画、木偶戏、连环画这些活跃于民间的艺术形式。这仿佛表明,大众正在最大限度地赢得自己的话语权。然而,如同五四时期一样,大众并没有真正发言;大众的情趣爱好仅仅在知识分子的争议之中得到被陈述的机会,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传播媒介。事实上,有关“大众文艺”的一系列论争使用的仍然是知识分子话语,大众无法听懂那些拗口的概念,大众甚至对于这场论争的存在一无所知。换一句话说,大众的话语权是被赋予的,决定赋予大众更多的话语权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一个战略动作。如果返回进行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的考察,还是前者掌握着主动权,大众不过是作为一个书面上的主人公被知识分子反复谈论。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已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转移。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启蒙内容增添了政治的比重。理论家没有掩饰自己的政治企图:选择大众熟悉的艺术形式,首要目的是传播革命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补充说,作家不该自命为大众的“导师”,居高临下地谈论“大众化”;大众的作家必须从大众之中诞生——这无形地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权威。人们可以从“大众文艺”的论争之中发现,“左翼”理论家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成就颇有微词。在他们眼里,汉语现状的最大问题还是不够通俗,这种白话文依旧保持了知识分子式的腔调。20世纪40年代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终于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彻底地颠倒过来。首先,毛泽东为何谓“大众”作出了清晰的定义:“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显然必须考虑到大众内部各个阶层所承担的革命重任:“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被简称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时,这位革命领袖在这份文献之中宣布,知识分子远不如大众聪明;尽管工人和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因此,如果知识分子不愿投入到工人、农民和士兵当中,无条件地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甘当忠实的代言人,他们将一事无成。这终于颠倒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如果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还无法彻底摆脱知识分子的趣味,这时,毛泽东以领袖的姿态肯定了工农兵的语言: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的确,这样的论述并非无可争议,但是,这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指示。这样的论述与其说是依赖逻辑的力量,毋宁说是以非凡的气势、声望赢得了人们的拥戴。事实上,这样的论述凝结了强大的历史能量;它同时包含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设定。历史将这种断言演变为最高级别的鉴定之后,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丧失殆尽。新中国建立之后,知识分子反复地温习这份文献,诠释这份文献,身体力行这份文献的一系列著名主张。历史将无与伦比的威望赋予这份文献的作者,几乎没有人还有勇气质疑这份文献的某些论点。这份文献庄严地宣告,工农兵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创造者,同时,工农兵还是精神生产的主人公。这表明,工农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完全丧失了精神生产资料之后,知识分子只能在物质生产者面前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不仅放弃了独特的价值体系,放弃了独特的话语表述,同时,他们的傲骨、自信也荡然无存。知识分子逐渐沦为被嘲讽和攻击的对象,甚至遭受残酷的肉体虐待。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然而,他们已经“失语”——他们所能表述的仅仅是几个众所周知的概念,那种俯视芸芸众生的高度已经不复存在。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厄运连连。相形之下,工农兵长期拥有第一号主人公的位置。民间文化被设定为工农兵所喜爱的形式,知识分子话语遭到了普遍的斥逐。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即是这种理念的产物。民歌历来属于“下里巴人”之列,自生自灭。五四运动前夜,北京大学曾经征集歌谣,登载于《北大日刊》。20世纪之初歌谣学运动是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的一次合作。可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已经丧失了那种清新的气息。这时的民歌一变而成为诗坛的正统地位,甚至被“钦定”为新诗的未来框架——毛泽东曾经提出,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是新诗的发展基础。这样,民歌甚至拥有了不容置疑的霸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作家在现实之中奇怪地发现,为工农兵服务仅仅是一种理论口号。工农兵形象仅仅是一种装饰,现实之中工农大众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发现甚至使作家成为一个极为矛盾的角色。赵树理的遭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赵树理是《讲话》的积极实践者。在赵树理看来,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并未进入乡村,知识分子的口气只配在乡村遭受嘲笑。知识分子必须尽量将自己的语言转换成生动的乡村语言,否则只能遭到村民的拒绝。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非议五四新文化传统,这一切仿佛使赵树理身价倍增。然而,赵树理的文学生涯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幸运。他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文学为民代言,甚至将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这样的立场迅速地 with 政治权力产生了冲突。许多时候,忠心耿耿地维持农民利益的习惯已经成为令人讨厌的绊脚石。赵树理因此遭到了诸多方面的警告。赵树理的尴尬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民间立场的破产。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关系的模式再度出现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源于一个延续了十年之久的社会事件——上山下乡。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这个社会事件终于终止,制造这个社会事件的理据得到了清算。然而,在一批曾经是“知识青年”的作家身上出现了微妙的情绪转折。农村的乡亲形象重现于这些作家的记忆之中,散发出一种暖人心意的温情。这样的记忆释除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由来已久的紧张。改造与被改造、教育与被教育之间的人为对抗消逝于文学的想象之中。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另一些作家又迈出了一步。对于韩少功、李锐、余华这些作家来说,工农大众并未远去。他们的工农大众不再为某种理论的强制性摊派,不再是某种冰冷的意识形态虚构;他们的工农大众就在身边,伸手可触——他们的工农大众是一个灼热的存在。这时,韩少功、李锐、余华与民间话语劈面相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无风之树》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这是 20 世纪末期文学对于民间的再发现与再认识。这些作家观察民间,走访民间,亲历民间,他们惊奇地意识到,民间并不是理论制造的紧箍咒,民间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文学有理由充分地描述工农大众,至少,文学必须充分地意识到工农大众的存在。不论知识分子试图与工农大众保持何种关系,他们首先必须与工农大众进行不懈的对话。无论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今天,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命题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然而,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讲话》之后,这个命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演变出一系列令人始料不及的历史景象。如果说,《讲话》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批判是延安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愈演愈烈的知识分子迫害却在历史上导致了文化建设的巨大损失。《讲话》对于工农兵的肯定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表述,又有革命队伍构成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由于各种政策的失误,工农大众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名义,成为文学之中的一种概念存在。直至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工农大众的质朴形象以及他们的生存状况才逐渐被一批深入生活底层的作家重新发现,以一种令人欣喜的文学现象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建立

王 伟

—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论争,双方各自在“最好论”与“垃圾说”的阵地上酣战未休。这种讨论的方式并非毫无裨益,但更有意义的工作不是拿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尺褒贬抑扬,而应着力去理解居于共时结构中的文学如何参与了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它与这个结构中的其他关系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百般纠葛。我们以为,该项工作至关重要的部分是准确把握毛泽东规划当代文学的理论文献——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①从宽泛意义上的“左翼”文学理论的流变来看,《讲话》无疑是对1928年“革命文学”以来理论探讨成果的权威化总结。所谓“权威化”主要是指《讲话》凭借毛泽东的领袖身份及其无比威望而获得的无容置辩性,这一点与“革命文学”初倡时所遭到的诸多批评、文艺自由化论争、文艺大众化讨论、京派与“左翼”的论战等的对比中可以看得较为清楚。从众声喧哗到定于一统,《讲话》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反映对象、批评标准等几个方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全面界定。《讲话》虽然诞生于1942年戎马倥偬之时,但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在延安等解放区的文艺界进行了预先演练,所以,它其实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理论基础及意识形态的正式确立,尽管其真正在全国范围贯彻执行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回顾漫长的文学史,尽管国家政权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的规训及惩罚,但文学的创作大体仍处于自发的松散状态。为了有效打击勃兴的“左翼”文学,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曾经炮制了“民族主义文学”大纲并出示了蹩脚的文学文本,这被胡秋原式的“第三种人”尽情嘲笑为“强奸文艺”。艺术并非至上,但也决不能沦落为政治的工具。如果说这种排斥国家政权干预、规划文学的做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以下简称《讲话》,文中凡引用之处不再另注。

还能暂时被容忍的话^①,那么,在“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②的时刻它自然成了被严厉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作家对文学的认识往往限于一隅,而相比之下,领袖对文学的想象则是更为通盘的考虑:构想它在整个新的国家建设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应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因此,不能将文学看成作家们关起门来舞文弄墨的简单游戏,它还是“经国之大业”,是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之地。《讲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这种文化领导权不只是在组织上得到保证,更重要的是要将它贯彻到作家的思想上并切切实实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所谓“国家文学”的要义正在于此。

中国是在洋人枪炮的威逼下被挟进现代社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肩上的巨石。毛泽东认为解放中国人民不能仅靠“军事战线”这个拿枪的军队,还必须有“文化的军队”,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看出,文艺被毛泽东纳入了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势力的军事动员体系中,而且被赋予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阿普特指出,动员体系意味着一种“权威的等级体系”,因为它将国家的目标神圣化。作为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动员体系,《讲话》也不例外,它对文艺的未来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详细描绘,而且尤为强调行动的迫切性或可操作性。阿普特还认为“新社会的建立者”“往往强调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来实现社会的重生。领导权是建立在政治纯洁基础上的。”^③可以说,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为了捍卫领导权而开展的一场政治纯洁化运动,而侧重文艺的《讲话》则是这场大的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纯洁化的所指当然是人,是进行文艺创作的作家,是那些虽然实际上担负着文艺战线重责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令毛泽东十分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

毛泽东认为延安文艺界虽然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但却存在着诸多缺陷,譬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这些促使他对自己领导的革命队伍做出了如下判断:“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换句话说,革命队伍中的一少部分同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虽然身在党内而心却另有所属,他们受限于自己的阶级意识而或有意或无意地采

① 毛泽东 1938 年 4 月 28 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文中指出:“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6 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页。

③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67-268 页。

用包括文艺在内的方式表达、宣传自己的主张,这就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造成了依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下简称“小资”)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的危险。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由此可见,革命队伍的高度纯洁化究竟有多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联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毋庸说文化领导权了。所以,对毛泽东而言,把这一小部分“小资”教育好并使之彻底脱胎换骨,对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举足轻重。在这个语境下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那个著名的对比: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与工人农民比起来“不干净”,尽管后者的手是黑的、脚上还沾着牛屎。所谓“不干净”是指灵魂上的不纯洁、不坚定,进而有对革命事业带来危险的潜在可能。

“小资”文艺家有着令人厌恶的“原罪”,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将他们关在门外,因为他们是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力量,而且,他们的思想与作品“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所以,问题就变成如何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缺点,洗心革面,融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阵营。其实,“小资”之所以颇费周折地被委以重任,更现实的原因是毛泽东青睐有加的工农兵一时还无法成功挥洒自己的生花妙笔。“小资”的未来不难预料,他们充当着过渡时期工农兵文艺家的写作教练。毛泽东在《讲话》后的一次报告——《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意思:我们需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对“小资”的利用“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①,这是一个“与狼共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对“小资”去污化、纯洁化并培养工农兵作家的过程,关键在于需要保持自己的领导权、主动性、独立性、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建国之后的一系列文艺运动就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譬如,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右派”作家等的全国性批判,新民歌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这些运动并非个别的、孤立的、突发性事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或政治纯洁化逻辑的必然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尤为强调保持党的纯洁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就是说,他从不认为领导权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完全夯实,而是始终抱有一种危机感,主张防患于未然,从而在每一次主动出击的斗争中向着纯洁化的目标不断迈进。这种斗争意识早在青年毛泽东的日记中就有鲜明的体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无独有偶,拉克劳与墨菲在谈及领导权时也特别张扬“对抗”的重要性,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对抗会有美好的纯洁化结局,而是认为有些冲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突或斗争永难消除。^①

“小资”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中的人数并不少,这里实际上牵涉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高度的政治化”。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对权威的深切关注。即使试图并且事实上似乎也脱离了他所成长于其中的传统权威,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对于其在发达国家的同行,更多地希望被吸收进一些强大的权威组织中。的确,知识分子争取从传统集体中解放的努力越是巨大,就越是希望加入一个新的、替代性的集体组织之中。高度政治化满足了这一需要。”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家可以被宽泛地团结在统一战线的网络中,因而政治化还不是那么强烈的话,那么,到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时,知识分子“第三条道路”的美梦也已然破碎,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大批知识分子满怀对新中国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而自发地奔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阿普特指出了令人遗憾的事实:“动员体系对知识分子是十分残酷的,它们迫使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宣传家或者将其当作无用之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将自身高度政治化才能立身并立言。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中的工农兵相比显得不够可靠,他们头顶总是罩着驱之不去的阴霾:蛊惑人心、自私自利、高高在上,等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呼吁知识分子必须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学生,只有先是真正地向群众学习才能继而群众进行教育。不过,在这个从“学生”到“先生”的转换过程中,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多少到达彼岸的希望。因为人民在革命过程中被神圣化,与人民打成一片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样一来,不光是领袖责怪知识分子脱离群众,就连知识分子之间也往往相互指责对方“自我膨胀、自高自大和事实上脱离了人民。在为平等辩护时,他们往往贬低自己的事业,直到没有人尊重自己为止”。^②

三

既然军事动员体系中的文艺成了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利器,那么,人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艺的受众或接受主体,这迥然不同于那种为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后者的接受主体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毛泽东明确界定了人民的范围:工人——革命的领导者,农民——革命最为广大、最为坚决的同盟者,兵士——革命的主力,小资——“也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毫无疑问,在大的政策方向上,与工农兵一样,“小资”也属于文艺的服务对象,尽管接下来毛泽东对“小资”进行了长篇

①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②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288页。

大论的严厉批评。然而,值得注意的对比是,《讲话》的前半部分在谈到文艺的“工作对象问题”时就把“小资”比较明确地丢在一边。毛泽东先是指出,抗战前的上海时期,革命文艺的接受者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衡之以人民的标准,他们显然属于“小资”之列,而抗战后的国统区尽管“有过一些扩大”,但仍以这些人为主,因为国民党政府有意把工农兵与革命文艺隔离开来。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文艺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不难发现,根据地的学生在毛泽东的构想中就不再归属于“小资”。“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谁来做这个工作呢?被隐约踢出服务对象行列的“小资”此刻是差强人意的唯一候选者。

文学史记载了古代的文人墨客在创作陷入困境时往往求诸民间语言的佳话,民众的语言犹如源头活水,可以滋润他们的创作灵感。与这种主动汲取后的新生不同,“小资”被要求放弃自己无味的语言而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进行文艺创作。因为小资的创作必须改变他们不熟悉人民群众——这时的人民就自然不包括“小资”在内——的重大缺陷,解决的办法就是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掌握对方的语言则是情感融合的必由之途。在《讲话》的图谱中,“小资”不仅需要放弃成为一个作家必备的语言追求,而且在创作时还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替换自己的“小资”灵魂,并且转变过去在创作题材上过于关注“小资”而远离大众的不良习气。就正常的文艺创作来说,接受主体与反映对象不见得必须相互吻合,但对毛泽东而言它们应该合而为一:革命的文艺是革命的作家对人民生活的反映,同时还应该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至此,“小资”作家们变得两手空空,畏畏缩缩,喑哑无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精英干云直上的豪气也一落千丈。无论是在工农兵团结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是在他们迎来胜利的日子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定是个锦上添花的配角,而更可悲的是当胜利者回首光辉岁月时,“小资”在学习工农兵过程中磕磕绊绊的创作实践也被横挑竖拣,被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堂皇的审判并施加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小资”作家们交上来的文学作业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知识分子群体也在政治结构的舞台上不断诠释自己的悲剧角色与命运。在毛泽东看来,这根源于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坚持,而这却无法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当文艺被拉进军事动员体系后,它能否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从而满足作家本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艺要能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阿普特敏锐地指出:“现代动员体系的意识形态最终反对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相关的邪恶如自我主义、委琐、孤立,将威胁到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情感。”^①因为个人或自我会使人们感到孤独

①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